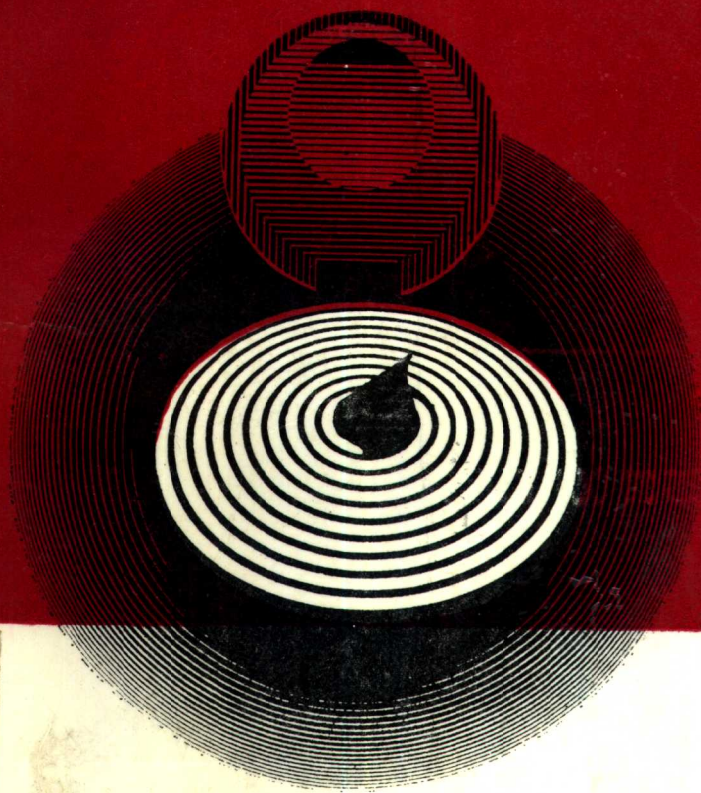


国民经济成长中的中国农业

张红宇 白天山 宋国兴 左常升 著



新华出版社

国民经济成长中的中国农业

国民经济成长中的 中国农业

张红宇 白天山 著
宋国兴 左常升

新 华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110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民经济成长中的中国农业 / 张红宇等著.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5.6

ISBN 7-5011-2895-2

I. 国… I. 张… III. 农业经济-经济发展-中国 W. F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5) 第09612号

国民经济成长中的中国农业

张红宇 白天山 著
宋国兴 左常升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插页2张 206千字

1995年1月第一版 1995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1000册

ISBN 7 - 5011 - 2895 - 2 / F · 398 定价: 10.50元

前 言

1979—1993年，我国改革走过了14个年头。

1992年，我国经济开始了她新一轮的腾飞。

每一个人都在思考。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拙著，实际开始构思于几年前。本人与农业部政策法规司的周彬彬、黄守宏、杨启荣等几位同仁，在积极投身于火热的改革实践的同时，也在体验着改革带来的成功喜悦以及改革带来的矛盾困惑。怀着对振兴我国农业的拳拳赤子之情，以《生存之路——何去何从的中国农业》为题，撰著了一部近20万字的书稿，试图对我国农业改革以来的成就与经验、矛盾与问题予以一一评说。但是，由于作者未曾预料的外部环境变迁，这部书稿未能面世。

然而，改革的实践并没有因为瞬间的波折而放弃长跑的竞赛；改革的探索也不会因为一时的困顿而停止必要的研讨。

因此，在着手撰写这部以《国民经济成长中的中国农业》为题的书稿之前，我和这部书稿的其他作者为它构思这样的基本思路：即以我国农村改革的土地制度、组织制度、乡镇企业制度、流通制度、经营管理制度改造与重建为基本线索，将农村改革放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中，检索改革的基本轨迹。总结经验，反思问题，追寻前途。除了注意历史的沿革外，更注重现

实，尤其是近几年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现实。

在确立基本思路后，我们为本书设置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本书将思路集中于农业与国民经济的相互关联中，以农产品供给变化以及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为线索，着重分析改革以来的问题。经济发展在经历了最初的供给制约的“炼狱”后，又立即陷入了需求制约的“泥潭”，为什么产品经济发展时期的数量推动型经济和农业，在市场经济始发时期，会经历如此多的磨难，改革的出路何在？

其次，我国农村改革离不开国民经济的整体动作。同时，改革非某一方面的单一动作，也非某一制度的单一突破。而是涉及从土地制度的变革到组织制度的创新，从乡镇企业的发展到流通体制的重建；从新一轮经营管理体制的更新到二元社会结构的改造方方面面的整体变革。为此，本书以较大篇幅清理农村改革的基本史实，并进一步廓清改革思路。

最后，放眼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未来，继续闭关自守的“长城”思路显然是不行的，欲实现我国农业的强国梦，必须放眼于世界，放眼于2000年之后，中华民族将以怎样的姿态迈向新世纪之门。

围绕上述设计，我们力求站在国民经济全局的立场上，本着实事求是，对历史负责，对现实负责的态度，在收集、分析、归纳、利用积累的学术资料的基础上，在各位作者的相互启迪以求共识中，作出了我们的写作选择。

值得说明的是，这是一本理论探索的书，但又并不是一本纯理论的书。我们无意编织一个理论框架，为建立一个体系增加大量冗长的理论辨释，而是从读者最感兴趣、最关心的争论和问题入手，进行立论、展开论述，并使全书在理论的阐述和实践的总结

中得到较好的结合，使其富有理论色彩，又增加通俗性和可读性。

当然，本书既非来自“权威”的论著，也非所谓厚积薄发，浅显、浮躁之疵颇多，对此恳切地企盼读者的批评指正。

应当提到的是，本书中很多思想的产生、观点的形成，得益于农业部政策体改法规司司长、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郭书田教授的启迪和帮助，对此，我们深表谢意。当然，对于可能引发读者歧见的地方，当由我们自行负责。

本书的写作分工为：本人负责本书的总体设计以及第三、第四、第五、第十章的写作；白天山负责第一、第二、第七章的写作；宋国兴负责第六、第九章的写作；左常升负责第八章的写作。

张红宇

一九九四年一月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欲强国先富农.....	(1)
一、“短缺经济”下的农业与国民经济.....	(1)
二、两部门的济经循环.....	(8)
三、从短缺走向“丰裕”.....	(11)
四、需求制约：悄悄发生的变化.....	(16)
五、是藏富于民吗？.....	(22)
第二章 寻找新的支点.....	(27)
一、困惑中的农业.....	(27)
二、认识农业问题的新视角.....	(30)
三、数量推动的窘境.....	(37)
四、市场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45)
第三章 创新中的土地制度.....	(49)
一、“黑土地”的奇迹.....	(49)
二、无可奈何的“平均分配”.....	(54)
三、关于“规模经营”的评说.....	(58)
四、勇于创新的抉择.....	(67)
五、“开发热”的误区.....	(73)
六、土地制度建设的“产权之谜”.....	(77)

第四章 农村组织建设：矛盾与出路·····	(81)
一、组织空白：人民公社的“遗产”·····	(81)
二、特例：科技服务组织的危机·····	(86)
三、有偿服务走得通吗？·····	(91)
四、划清组织建设的两条线·····	(94)
五、社会化服务的正确思路·····	(99)
六、“公司+农户”的组织创新·····	(106)
七、让农民自己选择·····	(110)
第五章 政府、市场与体制改革·····	(115)
一、传统的变迁·····	(115)
二、体制转换：摩擦与成因·····	(122)
三、政府行为调整：国际经验·····	(131)
四、来自“县”的探索·····	(140)
五、市场化中的分层管理体制·····	(149)
第六章 看不见的手：一个老话题·····	(162)
一、统购统销的反思·····	(162)
二、双轨制：病态的过渡形式·····	(166)
三、管制与“官倒”·····	(169)
四、“大战”的启示·····	(173)
五、风靡南北的“伪劣风”·····	(176)
六、改革与重建·····	(178)
第七章 乡镇企业：走出世纪末的巨人·····	(181)
一、倔强的“草根工业”·····	(181)
二、我国农村的支柱·····	(184)
三、结构变化与格局转换·····	(186)
四、发展中的矛盾与摩擦·····	(190)

五、整合与发展	(195)
第八章 小康之梦	(200)
一、漫漫“天堂”梦	(200)
二、超越贫穷的飞跃	(208)
三、农民负担过重——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	(213)
四、关于小康目标的讨论	(219)
五、何时梦成真	(224)
第九章 二元结构：不能回避的问题	(231)
一、城乡的差别	(231)
二、事与愿违的选择	(232)
三、再度扩大的鸿沟	(235)
四、二元结构：农业停滞的深层原因	(238)
五、敢问路在何方	(240)
六、发展经济学的回答	(241)
七、次优选择	(244)
第十章 强国梦的基础	(246)
一、农耕文明的新生	(246)
二、全方位的市场化	(249)
三、“三高农业”与资源优化配置	(257)
四、在国际贸易中寻求出路	(267)
五、关贸总协定——巨大的挑战	(275)
六、新世纪之门	(279)

第一章 欲强国先富农

一、“短缺经济”下的农业与国民经济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把社会主义经济概括为“短缺”经济，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始终处于一种“紧”运行状态。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至80年代初期，中国普遍存在消费品匮乏、生产资料供给紧张，交通运输时时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等现象。经济生活中不论消费品，还是投资品都很短缺。

关于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马克思有句名言：“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①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是个极不发达的典型的农业大国。落后而庞大的农业部门无疑为经济增长及结构转变增加了难度，但又是启动工业化进程的唯一可靠的物质基础和现实的要素贡献部门。在我国致力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努力推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发展一方面强有力地支持了工业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时时为发展速度设定一个难以逾越的增长上限。改革前，农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就是在这种矛盾困扰中极其艰难地谋求平衡与协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5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国民经济极其落后，1952年，全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04元，人均社会总产值折合美元只有79美元，远远低于一般国家工业化起点的初始水平；同时，农业部门是国民财富的主要提供者，现代工业部门异常弱小，我国面临发展工业、改造传统农业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当时苏联提供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工业化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样板，而且，我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与包围，全国人民有着强烈的改变贫穷落后与增强国力的愿望。于是，只经过短短3年的经济恢复时期，1953年，我国就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此为开端，在我国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以最大产出增长及最快速度推行工业化战略，以及由此而繁衍出来的一系列支持配套的宏观政策与经济体制，奠定了我国内向型农业大国发展模式的基础，铸成了改革前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础结构。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所有变化的总根源。

工业化战略的确立与实施，要求资源配置向重工业建设倾斜。农业部门也必须完全附属于工业化进程，被紧紧绑在工业化这辆战车上。正如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的，“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农业适应工业”。^①这一观点是形成工农业关系基本格局的主导思想。

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由于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全面展开，城镇人口急剧膨胀，1953年城镇人口已达7826万，比1952年增加663万，比1949年增加2061万。由于经济作物产区迅速扩大，对商品粮的需求成倍增长，1953年农村吃商品粮的人数增加到1亿，如果全部由国家供应，返销到农村的粮食估计不少于300亿斤（实际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1页。

317亿斤)。粮食需求量的骤增使供需矛盾呈尖锐状态。在1952—1953粮食年度内,粮食供需差额达40亿斤^①。1953年的粮食供需形势表明,靠市场收购已经无法做到供需平衡。于是,1953年底,采取了对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统购统销),很快又扩大到油料、棉花、生猪等其它重要农副产品,最多时达230多种。统购统销是形成工农关系的最基本的政策。

粮食供需矛盾只为统购统销政策的选择提供了契机,仅仅是表层原因,深层原因在于只有这样才能使农业完全适应工业。当时工业化战略对农业提出两大要求:一是产品需求,二是资本转移要求。而统购统销政策所具有的排斥市场性和价格与价值相背离两个实质性特点正好可以保证要求的满足。因为只有发挥排斥市场的作用,才能充分保证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目标的完成,进而解决居民食品消费需求与工业原料需求;而价格与价值的背离则以“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隐蔽形式,转移农业部门的收入,以解决工业化启动时期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要求。以农产品低价、工业品高价的价格分配手段使资源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必然结果。因为高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发展需要高的积累率,而获得高积累率必须有高的利润率,高利润率的获得又要求低的投入品价格。所以,必须实行劳动力的低工资和原材料的低价格政策。当时,居民生活开支的60%以上用于吃的方面,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87%。显然,只有农产品低价才能保证劳动力的低工资和原材料的低价格。这样,就形成了工业部门的高利润率和高积累率与农业部门的低利润率和低积累率,农业部门的很大部分利润因为扭曲的比

^① 薄一波同志新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2节“统购统销的实行”对此有详细论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价关系转移给了工业部门。这种牺牲农业利益，换取工业发展的政策，构成了我国工农业关系的基本利益格局。

在这一利益格局的作用下，国民经济增长及民众消费水平的提高主要受到农产品供给短缺的制约。

为了分析方便，只作一个大概的分类，社会对商品性农产品的需求可分为两类：（一）基本需求，主要包括满足城市居民生活必需的食物消费需求与人口自然增长所产生的新增需求，以及由于收入水平提高要求改善食物结构所产生的需求；（二）发展性需求，主要包括工业生产对农产品原料的需求与工业扩张对原料的需求增加量，农村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食物消费需求，以及出口换汇的需求。

与这两类需求相对应，视供给满足需求的程度，也可分为两类短缺形态：（一）不能满足基本需求的短缺形态，（二）不能满足发展性需求的短缺形态。第一类短缺主要影响居民的食物消费水平，第二类短缺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短缺的进一步加剧就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

1978年以前，我国始终处于两类短缺同时存在的状态。第一类短缺存在的表现形式为：

①对城市居民的食物消费品实行价格管制，票证限额，消费补贴。这种对食物的强制性配给使消费水平仅限于介乎生存与温饱之间。

②粮食产量增长速度落后于城市职工增长速度。1952—1978年间，全国在第二产业就业的职工人数增加3.6倍，年均增长6.1%，而同期粮食产量只增加85.9%，年均增长2.4%。如果与城市职工消费相对应的粮食收购量来衡量，二者的增长差额更大。这一时期，粮食收购量只增加29.9%，年均增长1%。供给缺

口的存在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加大配给强度，压低消费水平；另一是不得不增加进口，从1961年开始，我国变成了粮食进口国。1961年净进口粮食445.5万吨，而1950—1960年，我国一直都是粮食净出口国。

第二类短缺存在的表现形式为：

①形成对国民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我国工业增长具有内在的扩张与膨胀机制。当扩张到一定程度，对农产品的需求持续地大于供给时，便会遇到农产品供给的短缺临界点。一般而言，短缺临界点为工业增长设定了增长上限，然而，由于政治因素影响经济增长，实际上的工业增长都是超过短缺临界点而继续对农产品施加需求压力。这时，供需缺口进一步拉大，短缺加剧，无法逾越的“瓶颈”制约，迫使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降低速度，压缩需求，恢复到与农产品供给相适应的水平。

②两次落入“李嘉图陷阱”①。1952—1978年间，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非但如此，在工业化进程中还两次发生就业结构的逆转。第一次是1959—1961年，粮食产量连续两年大幅度递减，人均占有粮食由1957年的306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215公斤，人均减少91公斤②。农业危机导致了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负增长，城市已无力继续容纳原有的劳动力，于是，1961—1963年，采取强制性遣返劳动力返回农村的措施，使

① 由于粮食及其它农产品严重短缺而导致工业化停滞的现象，称为落入“李嘉图陷阱”。参见日中经济协会：《中日经济的中长期展望》第11—13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第127页，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

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吃商品粮的人数减少2800万^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由1958年的58.2%急剧上升到1963年的82.5%，第二产业劳动力由26.6%下降到7.6%。就业结构回落到1952年的水平。第二次是1966—1976年的10年“文革”时期，为缓解城市新增就业人口的压力，动员了约1700多万人到农村安家落户。

短缺产生的原因，从供给方面看，在牺牲农业利益的工农业利益格局下，工业部门和国家财政几乎吸纳了全部的农业剩余，农户及农村基层组织无力也无权进行扩大再生产投资。这时，农业产量的增加只能依靠两个手段，一是国家对农业进行补偿性投资，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是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刺激农民产生扩张性的供给行为。然而，在我国，这两个手段并不是政府稳定并增加农业产量的长期与一贯的行为，而只是作为一种应急“灭火”性的短期调节手段。而且，即使作为短期手段使用时，也远没有达到充分的程度。因此，所带来的也只是短暂的极不稳定的供给量增加，从一个长时期来观察，我国农业产量没有达到利用资源潜能所应达到的供给量水平，以致于一个农业大国竟做不到完全的粮食自给。

从需求方面看，传统发展战略必然要求围绕优先发展重工业做资源配置，从而使投资向工业部门大量注入。1953—1978年间，用于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累计达3407.5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54.8%^②；在传统体制下，企业不负盈亏，预算约束极软，具有强劲的内在扩张与膨胀冲动；加之工业企业效益低，人口自然增长快等因素，形成了对农产品供给与农业资源转的移巨

①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第4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李德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第31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大且持续不衰的需求。正是工业部门的过度需求导致了经济的非均衡增长,1952—1978年的26年间,农业产值年均增长2.7%,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1.4%,重工业产值增长达13.8%。然而,当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达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受到农业部门的供给短缺制约。

通过对农业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相关分析及典型分析,也可以看出二者的制约关系。

1978年前,我国农业增长共经历7次周期波动。通过对农业波动与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波动的观察,可以发现,工农业周期波动的次数完全相等,而且,时间上存在对应关系,或是农业波动领先于工业波动,或是同步波动。农业产量波动对轻工业产值波动具有最为直接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1953—1965年,农业产值增长率与轻工业产值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78,表现为高度相关。如果对我国第一次国民经济剧烈波动及调整的过程进行实证描述,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改革前农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及运行轨迹。

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同年,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用于积累的比重由上年的24.9%上升到了33.9%,1959年又进一步上升到43.8%,1960年仍是居高不下。三年积累额累计为1438亿元,比整个“一五”期间的积累总额多出44.1%。然而,从1959年开始,农业产量出现了全面大幅度下降局面。1959、1960两年粮食产量分别比上年减少15%和15.6%,1961年与上年基本持平;棉花及其它经济作物也是连续几年大幅度下降;农业总产值1959、1960两年分别比上年减少12.2%和8%。

农业产量的减少首先导致轻工业产值的下降。1960年轻工业产值就下降11.2%,1960年经济作物产量下降幅度最大,1961年也是轻工业产值降幅最大的一年,比上年下降17.6%。农业和轻工业

产值的相继下降，重工业已失去最基本的支柱。1961年被迫调低积累率，压缩基建投资，于是，重工业产值也开始下降，而且降幅之巨超过农业和轻工业。1961年重工业产值下降43.9%，1962年又比上年下降20.5%。重工业产值的大幅度下降，使工业总产值也从1961年开始下降。1961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35.2%，1962年又比上年下降13.4%。

1960年提出调整，1961年全面实施调整计划。在经济调整过程中，首先出现了农业的恢复。1961年粮食产量停止下降，1962年后持续上升；农业总产值也从1961年开始回升。但由于主要经济作物到1963年才停止下降，因此，轻工业产值经过1960—1962年连续三年的下降，从1963年开始停止下降，1964年转入正常增长。重工业产值及工业总产值都从1963年开始回升。至1965年，工农业生产基本恢复到了1957年的水平。

显而易见，一个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农业国家，农业构成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工业化的前期阶段，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主要受到农业增长的影响。中国既是低收入的农业大国，同时，由于实行排斥市场需求的经济体制，各经济部门间联系不是以市场为纽带，而是以行政命令为纽带，主要表现为产品形态的交换，价值形态的交换只具有统计意义。因此，改革前的中国，国民经济增长主要受到农产品产量的制约。

二、两部门的经济循环

农业与国民经济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作为居民消费和工业原料的农产品供给，直接影响居民生活和轻工业的发展，二是作为对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产生需求的农村市场，对消费品工业和投资品工业具有重大影响，三是伴随工业化进程，农业